

## 理论探讨

# 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研究与美国对非洲政策

龙向阳 郑建成

[摘要] 政治发展理论本身就是影响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一种外部因素。而亨廷顿不论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强调“政治稳定”,还是在80、90年代呼吁“政治民主”,这些主张基本上都是当时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一种反映,在非洲地区的具体表现就是美国调整对非洲的政策和向非洲国家输出民主。因此,“政治稳定”与“政治民主”究竟哪个才是“好东西”,这主要不在于亨廷顿的政治思想是否发生了变化,关键是当时美国的对外政策需要哪个。这不仅是我们研究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时应该注意的问题,而且是我们应用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研究以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实践时更应该谨慎对待的问题。

[关键词] 亨廷顿;政治发展研究;政治稳定;政治民主;美国对非洲政策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1)06-0047-51

塞缪尔·P·亨廷顿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曾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国际开发署和国防部办公室等政府部门的顾问。1977—1978年,亨廷顿还被美国总统卡特聘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小组的负责人。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通常只注意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具体内容,对亨廷顿政治发展研究的“政策含义”则关注较少。<sup>[1]</sup>事实上,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研究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有鉴于此,本文试就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研究与美国对非洲政策之间的关系作一探讨。

## 一、作为影响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之 外部因素的政治发展理论

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学者一般会同时考虑到其内部因素和外部影响,虽然在二者哪个更重要的问题上见仁见智。但我们只要稍微了解政治发展研究的起源,就会清楚地发现,政治发展理论本身就是影响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一种外部因素。对此,亨廷顿自己就曾有非常清楚的解释。

在亨廷顿和乔治·I·多明格斯一起为《政治学手册》撰写的《政治发展》一文中,他们指出,政治发展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但是有意识地使这一研究概念化和系统化则在60年代。这一局面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两股学术活动潮流汇合在一起的结果:

一是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区域研究的发展,另一个是政治学研究的“行为革命”。<sup>[2]</sup>如果说后者是学术自身内在发展的结果,那前者则明显是美国对外政策需要的产物。正如亨廷顿与多明格斯所言:“二次大战后,学术研究随着信号旗进入了针对苏联的冷战,然后又进入美国在亚洲、中东、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存在。”<sup>[3]</sup>台湾学者陈鸿瑜把政治发展研究的源起归纳为四个原因,包括“比较研究与方法的运用”、“科际整合之需求”、“提供发展策略之需要”和“世界文化统一的理想”。<sup>[4]</sup>这实际上是对上述两股学术活动潮流的具体展开。因此,仅仅从起源来看,美国的政治发展理论就有非常明确的为其对外政策——不管是对抗苏联,还是争夺亚非拉国家——服务的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政治发展理论本身就是影响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一种外部因素。

其实,亨廷顿和多明格斯在分析影响亚非拉国家政治发展的外部因素时,还有更加直白的说明。他们先是批评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等人的“依附理论”是根据教条而不是根据分析得出的,但紧接着则坦承:“美国的政治学家可能避开外部影响,因为他们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类影响的一部分。”<sup>[5]</sup>在这里,“美国的政治学家”当然包括亨廷顿自己了。

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在中国学术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在20世纪80

年代曾经“引领(中国)政治学的研究风气之先,并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范式。”<sup>[6]</sup>《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则不仅“在中国读者中没有引起什么争论”,而且还使亨廷顿在中国的影响“冲出了以政治学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界”,成了“民主化的军师”,这本书也被当作是指导民主化进程的“手册”。<sup>[7]</sup>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避免对亨廷顿政治发展研究的“前反思性接受”。<sup>[8]</sup>那亨廷顿政治发展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什么?它与美国对非洲政策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这是我们要详细分析的问题。

## 二、从强调“政治稳定”到呼吁“政治民主”

亨廷顿著述甚丰,研究涉及美国政治、军事、外交和政治发展等诸多领域。单就政治发展研究而言,亨廷顿就有很多专著和论文。<sup>[9]</sup>我们选择初版于1968年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以下简称《政治秩序》)和初版于1991年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以下简称《第三波》)这两本书,作为分析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研究与美国对非洲政策之间关系的重点。这两本书不仅是亨廷顿政治发展研究的代表作,而且对学术界的影响也最大。<sup>[10]</sup>

### (一)“政治稳定”与美国调整对非洲的政策

#### 1. 亨廷顿对“政治稳定”的强调及其“政策含义”

正如亨廷顿自己所说的,他写《政治秩序》这本书主要是出于对“政治稳定”的关注。<sup>[11]</sup>在亨廷顿看来:“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有的政通人和,具有合法性、组织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另一些国家在政治上则缺乏这些素质;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差异比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大。”<sup>[12]</sup>

当时,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国家政治稳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大多数亚非拉国家则政治衰朽。政治衰朽的国家一般具有“种族和阶级冲突不断加剧”、“骚动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军事政变接二连三”和“反复无常、个人说了算的领导人主宰一切”等共同特征。<sup>[13]</sup>亨廷顿认为,大多数亚非拉国家政治衰朽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即“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sup>[14]</sup>因此,对于广大亚非拉国家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政治稳定与权威。

基于上面的分析,亨廷顿批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里的对外政策未能抓住政治差距这一问题:“和政治差距比起来,经济差距才是关注、分析和行动的一贯目标……在整个50年代,我们对外政策的主导思想是:经济发展——彻底消灭贫困、疾病、文盲——为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所不可或缺。美国人脑海里的因果链条是:经济援助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促进政治稳定。”<sup>[15]</sup>

亨廷顿进而指出,如果说1965年亚非拉的政治衰朽和政治动荡比15年前蔓延得更厉害,那部分原因就是由于美国对外政策的上述错误所致。<sup>[16]</sup>他提醒美国政府及其官员,不仅应该认识到在亚非拉国家建立稳定的政权是美国的主要利益所在,而且必须采取切实的行动,促进这些国家的政治稳定。<sup>[17]</sup>这就是亨廷顿强调“政治稳定”的“政策含义”。事实上,亨廷顿在1965年发表的《政治发展与政治衰朽》(该文基本表达了《政治秩序》的核心观点)一文中,就毫不掩饰地强调“政治稳定”的“政策含义”。他说:“在南亚、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政府机构的有效力也是最紧迫的要求。除非这一要求得到美国的支持,否则在那些地方可供选择的仍然是一个腐败的政治体制或共产主义体制。”<sup>[18]</sup>亨廷顿政治发展研究从早期着重于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sup>[19]</sup>转而强调政治稳定,这实际上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调整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表现。其中,美国对非洲政策的调整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 2. 美国对非洲政策的调整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对整个非洲大陆始终没有一项积极、独立和明确的政策。<sup>[20]</sup>正如美国西北大学非洲研究计划处于1959年呈送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研究报告《美国对非洲的外交政策》中所说的那样:“美国对于非洲从未有过一个积极和有利的政策。直到最近时期以来,我们一向依靠欧洲友好国家的继续控制非洲,来作非洲的稳定性以及和我们进行可靠合作的保证,我们一向不愿意承认自治的原则完全适用于非洲的人民。”<sup>[21]</sup>

但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开始,美国便逐步给予非洲较多的注意。1960年9月,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提出有关非洲问题的五点计划。<sup>[22]</sup>肯尼迪上台后,更加重视非洲,因为1960年共有16个非洲新独立的国家成为联合国会员国,非洲在联合国的代表也首次超过拉丁美洲和亚洲。而且,非洲“所有地区不是已经独立,就是正在努力争取独立,以审慎为借口再也不能压制独立多久了。”<sup>[23]</sup>1961年3月22日,肯尼迪就对外

援助问题致函美国国会：“世界整个南半球——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和亚洲——它们均处在要求独立、实现旧的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的风险之中。这些新的国家需要贷款和技术方面的援助……毫无例外，它们处于共产主义的压力之下……但是我们60年代的对外援助计划的基本任务并不是消极地对抗共产主义；它的基本任务是做一个历史性展示，20世纪有如19世纪——南半球有如北半球一样，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能够并行发展。”<sup>[24]</sup>

在这当中，美国对通过援助促进非洲的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这一政策显得非常乐观。<sup>[25]</sup>而这就是亨廷顿所批评的美国“对外政策的主导思想”和“美国人脑海里的因果链条”。其实，时任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乔治·凯南对美国的这一政策在一开始就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尤其是你们对非洲的政治生活变得符合人道充满憧憬，非洲分裂为多少个独立的国家，鬼才知道……无论我们做什么，我展望这一地区，它基本上是幼稚的、迷茫的、不成熟的，看到的是各种形式的暴力、种族仇恨和自相残杀的斗争。”<sup>[26]</sup>

很不幸，非洲的局势让凯南言中了。20世纪60年代，许多非洲国家独立之后政变频繁，动荡不安。加上美国扩大侵越战争，使得国内外环境不断恶化，因此，约翰逊政府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便逐步调整美国对非洲的政策。<sup>[27]</sup>1965年，国务院顾问兼政策规划署署长罗斯托在一份文件中开始反思美国对欧亚大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军事与经济投入是否过度，承担的义务是否过多，以致于给美国的资源造成了越来越大或不能承受的压力等问题。<sup>[28]</sup>而尼克松上台后不久就向国务卿罗杰斯表示：“我认为我们需要非常严肃而慎重地思考我们与发展中世界的各国的关系。”<sup>[29]</sup>“关于美国在非洲的小型援助项目过多的问题，总统（指“尼克松”——引者注）说如果我们不大量地给予援助，共产党人就会乘虚而入的论点并没有打动他。我们不需要每次都对这样的危险作出反应。问题在于美国在特定国家里的利益是否至关重要。我们必须不让其他国家敲诈我们。”<sup>[30]</sup>

这个时期美国对非政策的调整涉及各个领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对非洲广大地区作出一些收缩和克制的姿态。<sup>[31]</sup>美国减少对非洲事务的介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非洲各国政治状态的默许，甚至是支持。非洲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实行民主政治失败之后，相继被以一党制或军政权为特征的集权政体所取代。<sup>[32]</sup>有学者曾指出：“（非洲）不少

军政权基本结束了在他们上台前政局长期动荡的混乱局面，人民初步得到了暂时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sup>[33]</sup>亨廷顿自己也承认：“某些形式的腐化有时能加强政党的力量，从而有助于政治发展。”<sup>[34]</sup>因此，我们认为，亨廷顿在《政治秩序》中强调“政治稳定”，这与美国在同一时期对非洲政策的调整基本上是一致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曾发表关于《政治秩序》一书的书评，批评亨廷顿没有清楚地说明一个强大的政府是否就是一个好政府，或二者是不相关的。<sup>[35]</sup>对此，亨廷顿完全可以说：沃勒斯坦“有时也误解了我论证中的政策含义”。<sup>[36]</sup>

## （二）“政治民主”与美国向非洲国家输出民主

### 1. 亨廷顿对“政治民主”的呼吁及其“政策含义”

亨廷顿在《第三波》这本书的一开始就明确表达自己的倾向：“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民主自身是一件好东西。”<sup>[37]</sup>不仅如此，亨廷顿甚至还用略带嘲讽的语气批评《政治秩序》一书的核心观点：“有一本阅读范围颇广的关于比较政治的书在开篇中甚至用这样一种结论来作为开场白，‘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是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是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sup>[38]</sup>因此，在学术界，对亨廷顿政治发展研究一般有所谓前期与后期的划分，即“从早期强调政治稳定，到后期强调政治民主的变化过程。”<sup>[39]</sup>可是，亨廷顿自己分明解释说，他在《政治秩序》中关于“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这两个变量间的关系，是作为超越时间界限的真理提出来的。<sup>[40]</sup>这就提醒我们，从强调“政治稳定”到呼吁“政治民主”主要可能不在于亨廷顿的政治思想是否发生变化，而是像他强调“政治稳定”一样有其特定的“政策含义”。那亨廷顿呼吁“政治民主”的“政策含义”是什么？他对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走向又是怎么看的？

《第三波》这本书探讨的是1974—1990年间一项也许是最重要的全球性政治发展，即大约有30个国家由非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亨廷顿认为“政治民主”是个“好东西”，原因有四：第一，政治民主与个人自由密切相关；第二，政治民主能维持国内的政治稳定；第三，政治民主会促进国际的和平；第四，政治民主在世界的未来对美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这是因为“美国是现今世界上最重要民主国家，其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身份与其对自由和价值所承担的义务是不可分离的。其他国家也许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政治制度，并持续他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但是美国却不能作出这一选择。”<sup>[41]</sup>

因此,在亨廷顿看来,自由、平等、和平的未来以及美国的未来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民主的未来。而对于美国来说,促进政治民主在世界的发展不仅是它的义务,更关乎它的国家利益,而且还是它与苏联争夺“天然同盟军”的机会。<sup>[42]</sup>这就是亨廷顿呼吁“政治民主”的“政策含义”。事实上,在1984年发表的《会有更多的国家实现民主吗?》一文中,亨廷顿运用社会学和比较政治理论分析后认为,对里根政府实施的“民主计划”(The Democracy Program)应该持更加谨慎的乐观态度,因为“美国影响其他国家政治民主发展的能力是有限的”。<sup>[43]</sup>但在1991年冬季,亨廷顿却发表了类似于电器使用说明书那样详细且具有操作性的文章——《如何使国家民主化》。<sup>[44]</sup>而这篇论文的具体内容就是从《第三波》一书中提炼出来的。如果我们注意到《第三波》是出版于苏联东欧剧变、冷战即将结束的1991年,那对亨廷顿这个时候呼吁“政治民主”的“政策含义”就会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关于应该进一步民主化的国家,亨廷顿根据在地理和文化上的差异把那些国家分成四大类:第一,包括苏联在内的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第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多数非洲国家;第三,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的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第四,亚洲的东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sup>[45]</sup>也就是说,整个非洲大陆国家几乎都要实施政治民主化改革。但亨廷顿似乎对非洲国家的进一步民主化并不是很乐观,因为在那里存在着很多障碍:首先,非洲的非民主国家对美国的影响不太敏感,美国在非洲促进民主的能力也十分有限;其次,非洲的领导人对民主价值的真正信念要么不存在,要么十分薄弱;最后,北非的伊斯兰文化不利于民主化改革,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却不存在有利于民主化的经济条件。<sup>[46]</sup>“不过,这并不能排除在二十一世纪在某个时候出现第四次民主化浪潮”,亨廷顿如是说,“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美国是民主化的主要促进者。美国是否继续扮演这一角色,取决于它的意愿、能力和其感召力。”<sup>[47]</sup>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向非洲输出民主,非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比亨廷顿的预想来得更早了一些。<sup>[48]</sup>

## 2. 美国向非洲国家输出民主

实际上,美国从里根政府开始就明确把“支持民主制度”作为其对非洲政策的一个目标。<sup>[49]</sup>在老布什政府时期,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艾莉森·罗森堡更是直言:“在非洲国家促进更加亲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倾向,加强它们面向市场的经济改革和依靠自己的

发展战略的动力。”<sup>[50]</sup>1991年8月,老布什在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中进一步强调:“民主与市场经济的观念必须在非洲大陆加以应用,起初这些观念曾因社会主义时兴而遭排斥。那个失败的实验已经走完了它的路程。非洲上层政界人士重新发现政治和经济自由是进步的源泉的基本真理,我们需要支持这股正在发展的现实主义思潮。”<sup>[51]</sup>

不仅如此,美国还与其他西方国家一起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确表示,它们会把给予包括非洲在内的国家援助和“好政府”、“尊重人权”的标准联系起来。<sup>[52]</sup>这也正应了亨廷顿的预言:“可以料想的是,在199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要求以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作为经济援助的先决条件方面都比其过去变得强大得多。”<sup>[53]</sup>因此,我们认为,亨廷顿在20世纪80、90年代对政治民主化的研究基本上是这个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一种反映。而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对“政治民主”的呼吁,与美国在同一时期向非洲国家输出民主的政策也基本上是一致的。

## 三、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起源于美国的政治发展理论从一开始就有为美国对外政策服务的明确目的,它本身就是影响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一种外部因素。而亨廷顿不论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强调“政治稳定”,还是在80、90年代呼吁“政治民主”,都是当时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一种反映,在非洲地区的具体表现就是美国调整对非政策并输出民主。因此,“政治稳定”与“政治民主”究竟哪个才是“好东西”,这主要不在于亨廷顿的政治思想是否发生了变化,关键是当时美国的对外政策需要哪个。

当然,这并没有否认亨廷顿对政治发展理论所作的贡献,也没有贬低他对政治理想的孜孜追求。亨廷顿就曾引用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的一句格言来说明政治科学的使命和政治学家应有的政治理想:“拯救这个世界,逐一逐次地感化一个又一个心灵。”<sup>[54]</sup>实际上,我们如果运用《第三波》中的理论观点来分析从2011年初延续至今的中东北非地区动荡局势,也会佩服亨廷顿的敏锐洞察力。<sup>[55]</sup>但是,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研究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如果仅把这种高度相关性简单地解释为亨廷顿对美国国家利益和西方价值观的维护,那么就会忽视其中的危险和陷阱。<sup>[56]</sup>这不仅是我们在研究亨廷顿的政治发

展研究时应该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在应用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来研究以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时更应该谨慎对待的问题。

#### [注释]

- [1] [9][39][56] 孟军:《寻求发展与稳定的平衡——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研究》[D],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8年版,第3—14页,第154—158页,第24页,第134—135页。
- [2][3][5] [美]塞缪尔·P·亨廷顿、乔治·I·多明格斯:《政治发展》[A],[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C],储复耘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8—149页,第148页,第262页。
- [4] 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M],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14—15页。
- [6] 王邦佐、潘世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
- [7] 刘军宁:《虚拟访谈:亨廷顿视野中的中国转型》[J],《南风窗》2009年第2期。
- [8] 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反思》[M],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7页。
- [10] 王正绪:《亨廷顿:主要著作和缺陷》[J],《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
- [11][12][13][14][15][16][17][34]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页,第1页,第3页,第4、5页,第5页,第6页,第5页,第64页。
- [18][19]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 *World Politics*, Vol. 17, No. 3, 1965.
- [20] 关于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对非政策及其演变,参见王延庆:《美国与刚果危机(1960-1963)》[D],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09年版,第13—28页。
- [21] [美]美国西北大学非洲研究计划处:《美国对非洲的外交政策》[M],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12页。
- [22] [25]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非洲手册(概况部分)》[M],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第200页,第201-202页。
- [23] [英]G. 巴勒克拉夫:《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M],曾稣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80页。
- [24][29][30]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三册)[Z],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2—1003页,第1090页,第1100页。
- [26][28]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一册)[Z],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简介:龙向阳,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广州,510631)

郑建成,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广州,510631)

收稿日期:2011-07-19

修改日期:2011-09-16

2010年版,第404页、第436—438页。

- [27][31][49][50] 梁根成:《美国与非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123页,第124—125页,第311页,第312页。
- [32] 参见克劳福特·杨:《非洲的政治》,[美]阿尔蒙德、小鲍威尔主编:《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展望》[C],朱曾汶、林铮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718—719页。
- [33] 陆庭恩、彭坤元主编:《非洲通史·现代卷》[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页。
- [35] Book Review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5, No. 3, 1969.
- [36] “有时也误解了我论证中的政策含义”这句话本来是亨廷顿用来指中国读者没有完全理解他1993年的文章《文明的冲突?》。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中文版序言”,第1页。
- [37][38][40][41][42][45][46][47][53]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第28页(为对应前文,此处对刘译稍作改动),第2页,第28—30页,第112页,第358—359页,第349、361、376、379页,第347—348、379页,第353页。
- [43] Samuel P. Huntington, "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9, No. 2, 1984.
- [44] Samuel P. Huntington, "How Countries Democratiz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6, No. 4, 1991-1992.
- [48] 关于20世纪90年代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和原因的具体分析,参见[英]威廉·托多夫:《非洲政府与政治》(第四版)[M],肖宏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9—259页。
- [51] 转引自朱重贵:《非洲政治变革的特点和面临的问题》[J],《西亚非洲》1992年第5期。
- [52] Guy Arnold, *Africa: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5, p. 801.
- [54] Samuel P. Huntington, "One Soul at a Time: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Reform",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2, No. 1, 1988.
- [55] 关于2011年初延续至今的中东北非动荡局势的特点、原因、影响以及对世界格局和中国的意义的分析,参见国际部课题组:《中东北非动荡局势分析及思考》[J],《国际工运》2011年第2期;张文木:《美欧可能联合削弱中国》[N],《环球时报》2011年5月9日。

---

**23 An Exploration on the EU's Multilingualism***by Chen Jie & Hong Yousheng & Yuan Jianjun*

Ever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EU has adopted the policy of multilingualism to promote linguistic diversity by respecting different languages.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the EU's strategy to promote multilingualism and reflects on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ides of such strategy. Despite its role in promoting integration,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dissatisfaction regarding both the practicalities and the costs of institutional multilingu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9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ast Asia Summit***by Wang Guanghou*

The United States becomes a formal member of the East Asia Summit in 2011. The U. S. government's attitude to the East Asia Summit has undergone dramatic change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held an indifferent and wait-and-see attitude to the East Asia Summit. Howev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ctively sought to join the East Asia Summit. There are four reasons. The first one is to strengthen U. S. dominanc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second one is to open up Asia-Pacific market. The third one is to improve America's international image. The fourth one is to deepen relationship with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U. S. participation in the East Asia Summit will not onl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me itself, but will also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Sino-U. S.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strategy of Asia-Pacific major powers.

**34 A Study on IPCC's Contribution to Global Governance of Climate Change***by Lü Xiaoli & Miao Jinmeng*

Climate change is one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which has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has made an indelible contribution to promoting global governance of climate change. The reports of IPCC have become important reference materials which help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understand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climate change. They positively promoted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negotiations and the drawing-up of many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legal instruments on climate change,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the Kyoto Protocol, and so on. The task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negotiations in post-Kyoto era is arduous. In this context, only when IPCC reforms itself can it continue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global governance of climate change.

***Theoretical Probes*****41 A Study of the View of the English School on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Comparison with the View of Tianxia System Theory***by Liu Han & Wang Cungang*

Among theories about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research method and basic points of the English School show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lthough there are shortcomings which derive from the trend of Eurocentrism and the method of historicism, its defini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discussions about maintenance of order are helpful to broaden and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order view of Tianxia System Theory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English School. To a certain extent, Tianxia System Theory overcom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nglish School, and shows a new path to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order.

**47 Huntington's Theory 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America's Policy to Africa***by Long Xiangyang & Zheng Jiancheng*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affects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a kind of external factor. Samuel P. Huntington emphasize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the late 1960s, and called for political democracy in the 1980s and 1990s, which both reflected America's policy 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n Africa, this policy took the form of the adjustment of its African policy and the export of democracy to Afri-

---

can countries. Therefore, which exactly is the good thing: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or political democracy? The conclusion rests not with the changes of Huntington's political thought, but with the needs of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of the period. This is not only the problem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n our studies of Huntingto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but also the problem we should handle with caution when we are applying Huntingto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represented by African countries.

## ***Countries and Regions***

### **52 The performance of the German Model under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Its Challenges**

*by Zheng Chunrong & Jiang Wen*

The financial crisis originated from the USA in 2007 also hit the German economy severely. Yet shortly after the crisis, Germany was seen as one among the countries that had witnessed a recovery beyond expectation.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ermany, namely the "German Model" and analyzes the reason for the economic recovery in Germany through combing the German economic performance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with the core elements of the "German Model". In the end,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this model is facing.

### **58 Europeanization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Slovakia Since the 1990s**

*by Zhou Zhongli*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Slovakia since the 1990s has also been a meaningful process of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EU played a great role in promoting the Slovak political transition by stimulation and regul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Mečiar government, the Slovak Republic was excluded from accession negotiations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institutional instability". The Dzurinda government following the 1998 election gave top priority to rectifying these disadvantages and made great progress in constitutional reform, political party system,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and rule of law.

### **64 Decision-making Model and Japan's Environmental Diplomacy—Japan's Ratification of the Kyoto Protocol as Case Study**

*by Gong Lili*

There was discussion in Japan after US withdrawal from the Kyoto Protocol. One group held that Japan should be in line with the U. S. and ratify the Kyoto Protocol if the U. S. ratifies. Another group contended that Japan should ratify the Kyoto Protocol even if the U. S. withdrew because Japan should be a leader on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issue. This paper explains Japan's stance towards the Kyoto Protoco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making. The political goal of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the push from NGO, the pressure from EU and the concession of Japan's industries were the reasons why Japan endorsed the Kyoto Protocol. However, Japan wanted to break away from the framework of the Kyoto Protocol in the post Kyoto era because Japan thought the protocol was unfair to Japan.

### **70 The Sahelization of 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nd Its impact on Algeria**

*by Li Yi*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 countries of the Sahel region have been increasingly affected by the activities of 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QIM). This geographical shift of AQIM was the result both of a weakening of AQIM within Algeria, due to the tough counter-terrorist measures adopted by the Algerian government, and of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the wider operational freedom offered by the Sahelian environment. This is not only a great threat to security of the Sahel, but also affects the balance of the Maghreb key forces. In this context, gaining a position of primacy in the Sahel and in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in the region could be used by Algeria as a tool of influence in the wider area of the Maghreb. Bolstering its role as a "security provider" in the Sahel is instrumental for Algeria's overall foreign policy ambitions.